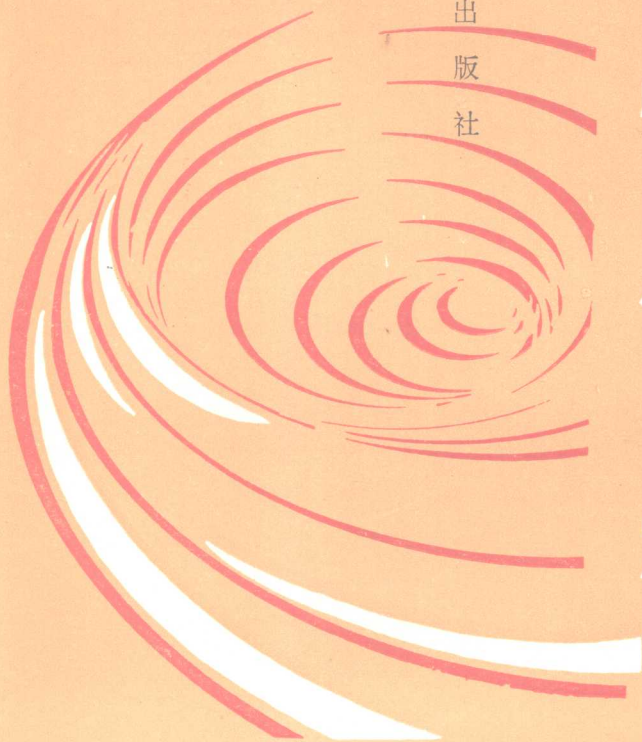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论战

梁满仓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郑丽敏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梁满仓 编写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0,000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872—2/K·120 定价：1.10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梁满仓 编写

## 目 录

-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
- 二、“新思潮派”和“动力派”..... (7)
- 三、史学家的新贡献..... (16)
- 四、“神州国光社”与福建事变..... (27)
- 五、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争..... (33)
- 六、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43)

30年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政治思想战线的斗争，它从3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在十分严峻的武装斗争环境中，为什么还要开辟另一条战线，并领导这场斗争呢？是什么问题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使许多人都参加进去，并使之持续了数年之久呢？这场论战的结果又怎样呢？我们将从六个方面探讨上述问题。

##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高举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与此同时，又在文化思想界发动了反动的文化“围剿”。在这种“围剿”中，一些反动派的御用文人群起鼓噪，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各种曲解，以模糊人们的视线，转移人民的斗争方向，企图达到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目的。在这种反

革命文化“围剿”中，少数有影响的派别充当了反动的急先锋。

第一个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1928年，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办起名为《新生命》的杂志。从这年10月起，陶希圣陆续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的文章。后来又把这些文章编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书，由新生命书局出版。由于陶希圣等人与《新生命》杂志的密切关系，所以被称做“新生命派”。陶希圣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他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商业，有官僚，因此，中国社会早在那时就脱离了封建制度阶段。这样，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那么历代的统治者是代表了什么阶级呢？为了自圆其说，陶希圣便杜撰出一个“士大夫阶级”，认为士大夫是拥有特殊利益的阶级，“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从上述论点出发，陶希圣进而对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荒谬的解释。他说，从秦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崩坏，秦代至清朝，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发达的特殊社会，即“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了。以后他又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陶希圣如此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目

的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个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1927年以后，为了与蒋介石争权，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打出了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实现民主政治的招牌，拉拢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失意军人，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政治派别。1928年5月7日，他们创办了《革命评论》，6月1日，又办了《前进》杂志。1928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因此被称为“改组派”。改组派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他们不但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封建制度，甚至还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大地主。他们说，虽有一些百亩以上的农户，但由于他们家庭人口平均在10人至12人，如果在家中自己分配，每人也不过10余亩。因此中国没有土地可分，不需要搞什么土地革命，更不存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改组派不但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公开打出“防共和剿共”的招牌，可见他们虽与蒋介石在争权上有矛盾，但在反共反革命这点上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

第三个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1929年至1930年，胡适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出路问题。他和原来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在上海开设“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杂志，并提出“中国的现状”和“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等题目进行讨论。胡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反映在他于1930年4月写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中国的现状如何？他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

扰乱，即“五鬼闹中华”是中国的现状，而“封建势力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人之国”。因此，“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自己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都是盲动。”怎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呢？胡适开了一个“救世良方”，即“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的不断改革”。胡适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三个派别，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中比较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反动派别。他们都是通过歪曲中国社会性质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在中国社会性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对各种各样的反动观点进行批驳。

20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斗争，这场斗争又通过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影响。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互相对立的意见。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也是如此。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苏联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这种斗争更趋于激化。在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关于建立苏维埃，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等问题上展开了大讨论。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商

业资本主义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商业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他们否认封建压迫还在中国占着主要地位，否认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在国际斗争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只要争取关税自主，就是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使中国革命具有反帝性质。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蒋介石上台，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了中国。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封建势力只是微乎其微的“残余”。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将得到相当的和平和统一，目前尚无革命局势。无产阶级只能等待条件成熟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则认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仍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在广大农村，农民收入的70%归地主豪绅所有。地主阶级不但掌握经济权力，而且还掌握行政和司法权力。封建残余及封建军阀官僚是中国国内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因此，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以反对封建统治。此外，帝国主义不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还控制支配了中国的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等工业的命脉，因此还要反对帝国主义。中国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

1929年初，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国，这场争论基本结束。但托洛茨基继续坚持上述观点，并把托派活动扩大到中国。这年春天，中国的托派分子彭述之等人从莫斯科留

学回国的同学那里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随后，他又将这些文件拿给陈独秀看。这些文件在他们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托洛茨基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采用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这正好给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开脱了责任。因为决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是共产国际，这样一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而不在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出于推诿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全盘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局势的见解，形成了一套取消主义理论。这个理论，集中反映在1929年7月28日、8月5日和8月11日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中。首先，陈独秀认为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蒋介石所建立的政权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通过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已经基本完成。从国家政权来说，中国已成为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其次，陈独秀认为中国很早便有商业资本，封建剥削制度及其残余早已被破坏。中国地主阶级已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的主要形式。特别是经过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封建残余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从经济上看，中国也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了。最后，陈独秀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认识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由于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封建势力的不复存在，反帝反封建已失去意义。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

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理论，即主张取消一切革命行动、取消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取消苏维埃、取消红军和一切群众革命武装，取消罢工、游行、示威，最终取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受到了我党的严肃批判和坚决斗争。但陈独秀拒不接受党的警告，拒不放弃其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在他被开除出党之后，还建立了托陈取消派的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这样，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与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后来这场斗争又公开展发展到社会上，与社会上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大论战合为一体。

建党初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未能清楚地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而大革命的失败，迫切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尽快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情，以制定自己的方针战略，更好的领导中国革命。党内出现的托陈取消派，与国民党反动的文化“围剿”中的御用文人们沆瀣(hàng xié, 沆泄)一气，肆意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否定我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对这些反动理论不予批判，就会导致对中国国情的错误认识，也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党不得不在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领导一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

## 二、“新思潮派”和“动力派”

1930年上半年起，“新思潮派”和“动力派”围绕着中

国到底是什么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新思潮》原为创造社出版的刊物，1929年11月创刊。创刊后不久，郭沫若、潘东周、丘旭等人曾经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陶希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30年代初，党中央宣传部及其领导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批驳托陈取消派及其它谬论。1930年4月15日，《新思潮》第五期《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发展及其前途》，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这年5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社联是我党领导下的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组织，当时任中央文委书记的朱镜我兼任了社联党团书记。《新思潮》的几位编委王学文、彭康、杜国庠、潘梓年都是“社联”的党团成员。这样，《新思潮》成为“社联”的机关刊物。在此之后，《新思潮》第六期、第七期继续刊登了许多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新思潮》第七期之后，刊物遭到封禁，党的刊物《布尔塞维克》又成为革命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阵地。伯虎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沈泽民的《第三期的中国经济》，张闻天的《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瞿秋白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等文章，都曾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同时，张闻天、刘苏华、

王学文等人，还争取在公开出版的《读书杂志》、《读者》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由于这些同志最初以《新思潮》为阵地，所以被称作“新思潮派”。“新思潮派”的主体，是我党领导下革命的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同各种反动思潮进行斗争。

《动力》杂志是由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办的，创刊于1930年7月。当“新思潮派”对托陈取消派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全面批驳时，托派分子严灵峰以《动力》杂志为阵地进行反扑。他在《动力》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一文，宣扬托洛茨基的观点，对《新思潮》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进行反驳。在第二期上，他又发表了《再论中国经济问题》。1931年6月，他出版了名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论文集，将他在《动力》杂志上的两篇文章以及后来写的《我们的反批评》等收集进去。1932年，他还写了《追击与反攻》一书，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另一名托派分子任曙，在1931年初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书，宣传托派观点，并在《读书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任曙和严灵峰的关系，最初还有些“误会”。任曙曾写文章批评过严灵峰。严灵峰误以为任曙是任卓宣（即叶青）的化名，所以将任大骂一顿。但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坚持托派观点的共同立场，使他们很快消除了误会。1931年任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严重声明”，否认自己是任卓宣，严灵峰则承认自己“认错了人”，请任“原谅”

他的“误会”。和他们共唱“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托派调子的还有刘仁静。由于他们最初以《动力》杂志为自己的阵地，所以被称作“动力派”。

“新思潮派”和“动力派”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的论战，中心问题就是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当时争论的内容上看，双方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主要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即通过论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究竟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了主导地位，还是帝国主义的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占着优势。

“动力派”主张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他们片面地夸大了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动力派”认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向中国大量输入了商品，促使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这些和中国原来已经相当发达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使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自然经济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它的产品以满足领主和农民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商品经济则是以满足市场需要和准备交换为出发点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完全崩溃。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必然结果。因为“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地位”。从对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资本主义“促进”作用片面夸大出发，他们进而得出中国社会现实的两个结论：

第一，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微乎其微。如严灵峰认为，商品侵入农村，使农民急剧破产，农民破产离开土地，又导致靠农民为生的封建领主官僚也无法立足，因此便整批出卖土地。于是拥有少数货币的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便趁土地上投资轻、本利厚的机会购买土地，他们是新式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与农民的关系，同城市中资本家与工人一样。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也说：“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要“把握着资本主义关系去理解农村土地问题”。

第二，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动力派”既然认为帝国主义的人侵绝对地破坏了封建体制，也必然会得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地发展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结论。为了给他们的结论找根据，他们首先采用以偏概全的手法，例举一些个别数字，来说明其论断的“科学性”。严灵峰例举了1913年至1920年工业机器进口增长的数字，1915年至1922年中国轻工业发展的数字，1921年至1926年纺织工业发展的数字和1913年至1925年电气厂增长的数字，来说明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蒸蒸日上之势。但这种论证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它只说明在1913年至1926年这段期间中国工业有所发展，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于是他们便在“农村要受城市领导”命题上肆意发挥，以弥补上述论证方面的严重缺陷。如严灵

峰就强调说，因为中国农村的农业经济再生产的过程，要依赖城市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农业经济不具备第一等的意义，所以，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动力派”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站住脚，还制造了“华洋两种资本应一视同仁”的理论。他们认为，既然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因此，就不能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矿山、铁路等推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外，华洋资本应不分彼此，两者都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既然在中国境内的华洋两种资本是被当作统一的中国经济看待的，那么帝国主义的在华资本，再加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资本，就压倒了封建经济而支配了全国经济生活。

“动力派”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思维逻辑之上的，即帝国主义入侵，造成中国封建经济的崩溃，由此又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只强调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作用，否认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和破坏；只看到外国资本入侵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瓦解，没看到它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依赖和勾结。因此，这种理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国情。按照这种观点，必然得出否定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论，因此这种理论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对这种理论，“新思潮派”给予了全面的批驳。

针对“动力派”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歌功颂德的理论，“新思潮派”指出：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经济作用是两

方面的。一方面，它在中国造成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变成了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外国资本的侵入，造成中国经济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工人市民生活困难，强盗增加，土匪蜂起。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封建势力作为其在华利益的代表者，他们之间的争夺，更引起中国的军阀混战，使中国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交互作用，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但不能独立发展，而且遇到重重阻碍，广大农村的封建剥削不但不能消除，反而日益加深。“新思潮派”还指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资本主义固然是商品经济，但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只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它的出现是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长期与封建地主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则说明它不代表一定的生产方式，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制度。至于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固然使中国的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但不能说是真正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为了保证它的原料供应和商品输出，为了使民族资本不致形成足能与它竞争的力量，帝国主义宁可把封建势力作为同盟者，扶植和维持它的力量。

对于“动力派”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观点，“新思潮派”也给予批驳，指出判断地主阶级是资本

主义化了，还是封建的，其标准主要看它的剥削方式。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是利用新式的生产技术，雇佣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的土地，而中国地主阶级完全不具备这个特点。他们把土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中国农村里，土地所有权虽集中到地主阶级手里，但使用权却是分散给千百万农民的。这同过去封建时代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没什么根本区别。至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农村，也体现为一种封建剥削关系。因为在中国农村中，很多地主，同时也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如果农民交不上当年的田租，就会被当做向地主的借款，到期偿还本钱和高额利息。商业资本除了用高利贷方法，还用贱价收买农产品的办法，使农民低价卖出自己的产品，而又用高价买进日用必需品。根据以上分析，“新思潮派”得出与“动力派”相反的结论：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是以现存的土地关系为基础的。土地问题一日不得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的解放，便一日没有希望。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切身的急迫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

中国的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了支配地位吗？

“新思潮派”回答说，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没有任何国内经济成分能够属于支配地位。正在没落的封建经济固然不能，而在畸形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也不能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生活。正在没落的封建经济固然不能领导整个国民经济